

# 非再现主义史学理论与当代西方史学观的重塑<sup>\*</sup>

苏 萌

**【提要】** 史学观是一切史学理论的基础。总体来看,20 世纪的西方史学理论奠基于两段式的再现主义史学观:史学是史学家与过去的再现活动,可分为确定事实与组织事实两个部分。近十年来,这一长期规定西方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史学观受到了库卡宁和罗斯的挑战。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史学是史学家之间的论辩活动,旨在证成断言而非再现过去。他们基于非再现主义史学观的非再现主义史学理论,既化解了两段式再现主义带来的如何客观评判主观性质的史著的难题,也与史学家实际工作契合。不过,非再现主义背离了史学家对自身工作的自我认知,因而可能被史学家拒绝,甚至损害史学事业,需要学界谨慎分析。

**【关键词】** 史学观 再现主义 非再现主义 客观性 真实性

正如历史观深刻影响历史家的历史研究,史学观(即关于史学之本质的先在性观念)深刻影响史学理论家的理论构建。20 世纪以后,西方史学理论家的史学观往往认同史学是将已逝过去以某种方式再现于史著的活动。这种再现主义(representationalist)史学观,构成了 20 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根基。然而,近十年来,再现主义史学观受到了针锋相对的挑战。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重要学者乔尼-马蒂·库卡宁(Jouni-Matti Kuukkanen)和保罗·罗斯(Paul Roth)从不同角度提出,史学是旨在证成断言而非再现过去的论辩活动,并基于非再现主义(non-representationalist)史学观构建了非再现主义史学理论。他们的观点虽然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但还少有学者论及他们对史学观的重塑以及这一重塑的源起、价值和问题。<sup>①</sup>

史学观的变化无疑牵动着西方史学理论乃至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变革。本文尝试以史学观的重塑为线索,检视西方史学理论的这一动向。本文通过梳理 20 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的三场论争,明确西方再现主义史学观的具体特征、根基地位和内在问题,以此说明非再现主义史学观的变革意义和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中的历史真实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CSS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对库卡宁的讨论见《历史哲学杂志》2017 年卷以其论说为核心的圆桌论坛,另见 Alun Munslow, “Review”,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0, No. 3, 2016, pp. 476 - 478; Dawid Rogacz, “Unheeded History: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Jouni-Matti Kuukkanen’s ‘Postnarrativism’”,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2, No. 4, 2018, pp. 474 - 489; Adam Michael Bricker, “Postnarrativism, Historiographical Evaluation, and Truth”,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sue 15, 2021, pp. 106 - 124; 夏玉丽:《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探求》,《史学理论研究》2021 年第 5 期。对罗斯的讨论见 Krzysztof Brzechczyn, ed., *Towards a Reviv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round Paul A. Roth’s Vis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s*, Brill-Rodopi, 2018; Jonathan Gorman, “Paul A. Roth and the Reviv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sue 12, 2018, pp. 1 - 14。对非再现主义的整体性讨论,见 Eugen Zelenák, “Two Versions of a Constructivist View of Historical Work”,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4, No. 2, 2015, pp. 209 - 225; “Representation”, in Chiel van den Akker,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Theory*, Routledge, 2022, pp. 299 - 315。上述研究尚未详论史学观问题。

生成背景;尝试从库卡宁和罗斯的非再现主义史学理论出发,厘清非再现主义史学观的内涵与价值;从理论应用的角度,探讨以非再现主义重塑史学观的实践困境。

## 一、20 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再现主义史学观

根据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的说法,以史学为对象的历史哲学即当前学术语境中的史学理论,开端于1938年,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这一年分别出版了《历史知识问题》与《历史哲学导论》。<sup>①</sup>到20世纪末,西方史学理论先后发生了至少三场影响较大的论争: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与曼德尔鲍姆的客观主义论争(20世纪30年代);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威廉·德雷(William Dray)等人的历史解释论争(20世纪40—60年代);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等人与其批评者的历史叙事论争(20世纪70—90年代)。论争焦点的变化中蕴含的是一以贯之的史学观。参与论辩的学者往往相信,史学是史学家与过去的再现活动,可分为确定(ascertain)事实<sup>②</sup>与组织(arrange)事实两个部分。这种两段式再现主义史学观构成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根基。

20世纪30年代的客观主义论争的核心论题是美国史学家从兰克史学中提炼的客观主义信条,即史学家可以“如实直书”。论争双方中,贝克尔和比尔德一方是客观主义的否定者,两人早年就学于美国本土史学的奠基人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Robinson),并分别在1931年和1933年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与两人对垒的客观主义捍卫者是彼时刚从耶鲁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曼德尔鲍姆。这一情况表明,论争双方的语境其实并不对称——贝克尔和比尔德是基于个人经验面向史学实践,曼德尔鲍姆是基于哲学训练面向哲学问题。不过,语境不对称反过来也意味着,若双方存有共识,这些共识将更具代表性。事实上,双方至少共享两点认识:一是史学家可以确定事实;二是史学家对已确定事实的组织决定了史著是否客观。它们共同指向了两段式再现主义史学观。

首先,论争双方明确肯定了史学家可以确定事实,并再现过去事件。曼德尔鲍姆指出,史学家可以通过史料间的相互印证,确证陈述是否符合过去事件的某一特征;贝克尔和比尔德也强调,史学家能够基于史料客观地确定过去事件的散碎细节,如某人某时在某地如何。<sup>③</sup>贝克尔虽然在其他地方论证了事实的构建性,但他在那里的核心论点是“事实”如“凯撒被刺死于元老院”是由“若干简单事

① 路易斯·O. 明克:《历史的哲学和原理》,伊格尔斯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② 在西方史学理论中,事实(fact)既可指事件(event)的一部分,亦可指对事件的认识。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2, 1995, pp. 238–239. 本文引文多用前者,因此本文中“事实”一词仅特指事件的一部分。

③ Maurice Mandelbaum,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Harper Torchbooks, 1967, pp. 184–188; Carl Becker, “Review”,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49, No. 3, 1940, pp. 363–364; Charles Beard,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4, No. 3, 1939, pp. 571–572.

实”如“凯撒被23把刀刺中”构成,<sup>①</sup>这里的“事实”实指多个事实的组合。其次,论争双方认为,史著能否准确再现过去,满足“如实直书”的客观性要求,取决于事实如何被编织进史著。贝克尔和比尔德基于组织事实的主观否定了史著的客观。贝克尔强调,史学家是在“现实和情感需要”的引导下挑选和组织事实,史著因而是“真理与虚幻的混合”,是“对曾经存在的现实的一种节略的且残缺的再现”。<sup>②</sup>比尔德也认为,“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对事实、过去碎片记录的挑选和组织”,且史学家组织事实的原则只能是他们对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历史整体的主观信念,史著因而只是史学家据其信念对事实的主观挑选和组织。<sup>③</sup>曼德尔鲍姆则从组织事实的客观论证了史著的客观。他相信,史学家价值观虽有影响认知起点或研究主题的选择(如罗马史还是英国史),但它并未渗入认知过程或组织事实,决定后者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间关系(因果和相关),认知结果或史著可以符合过去实情。<sup>④</sup>

整体上看,贝克尔等人一方面相信史学家可以确定事实、再现过去;另一方面也着重分析了史学家如何组织事实及其对再现过去的影响,并得出了不同结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相信史学是史学家与过去的再现活动,也默认了这一再现活动至少在理论分析中可分为确定事实与组织事实两个部分:前者关涉能否再现过去,后者关涉再现是否准确。客观主义论争中的这一两段式再现主义史学观,同样存在于20世纪40—60年代的历史解释论争。

历史解释论争的核心论题是历史解释是否属于科学解释。1942年,年轻的德裔旅美哲学家、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代表学者亨普尔首先肯定了历史解释的科学性。其依据是,科学家在解释自然事件时须运用规律,而史学家在解释历史事件时同样会或明或暗地运用规律,如“风蚀区农民移居加州‘是因为’长期干旱和沙尘使其生存极为脆弱”,暗中运用了“人口倾向于移居至生活条件更好的地区”。<sup>⑤</sup>由于亨普尔的论断涉及包含史学在内的统一科学是否可能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大批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解释问题。其中,帕特里克·加德纳(Patrick Gardiner)、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等人偏向肯定,威廉·沃尔什(William Walsh)、沃尔特·加利(Walter Gallie)等人偏向批评。批评者中,以加拿大哲学家德雷最具代表性。他指出,历史研究的重心是个性而非共性,是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意义而非与其他革命的共有特征,这导致历史解释的形式多为“大革命因其是某时某地某些事导致如此后果”,而非“大革命因其属于革命导致如此后果”,因此,历史解释不涉及基于共性归纳的普遍规律。<sup>⑥</sup>在德雷看来,历史解释实为对事件中的行动者缘何如此行动的理解,对行动的理解即对行动者内心盘算即行动理由的重建,重建方法是基于证据探究行动者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体认,据此在史学家心中重演其动机。

从表层的论争议题看,亨普尔和德雷的分歧在于历史解释的性质。从深层的论证思路看,双方

① Carl Becker, “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he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910,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10/10/detachment-and-the-writing-of-history/644705/> [2023-09-01]

②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7, No. 2, 1932, pp. 228, 231, 235.

③ Charles Beard, “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9, No. 2, 1934, pp. 220, 224-226, 228-229.

④ Maurice Mandelbaum,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pp. 177-202.

⑤ Carl Hempel,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 i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39, No. 2, 1942, pp. 40-41.

⑥ William Dray, *Law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47-49.

的分歧在于,当史学家用“因此”“是因为”“结果是”这类解释性词语连结事件时,其依据是什么。亨普尔坚信,是普遍规律将作为原因的事件与作为结果的事件连接起来,以此说明后者因何必然发生;德雷认为,是行动理由将前后事件关联起来,以此阐明后续事件何以能够发生。由此视之,历史解释论争与客观主义论争一样,是将组织事实置于理论重心,只是前者关注科学性而后者关注客观性。亨普尔和德雷也相信史学家可以确定事实。亨普尔提出,史学家可基于史料推导进而确定关于过去事件的知识。<sup>①</sup> 德雷也写道,“(过去事件)序列中的每个事件都是由证据独立地建立。”<sup>②</sup>其《历史哲学》更是将史学家任务明确区分为“建立事实”与“解释事实”两部分。<sup>③</sup> 两人的历史解释理论因此预设了史学的再现性,以及确定事实与组织事实在理论分析中的区分。

两段式再现主义史学观同样存在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历史叙事论争。发起者是美国思想史学家怀特和荷兰哲学家安克斯密特,两人后来也具有“叙事主义”“文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标签。从结论看,他们与贝克尔和比尔德多有相似。第一,他们承认史学家可以确定事实,再现过去事件。怀特在其《元史学》中提到,文献记录可以证实、报告过去事件。<sup>④</sup> 安克斯密特更明确指出,德国和荷兰的历史哲学惯于区分“历史研究”与“历史的叙事性写作”:前者意图“知晓真实发生了什么”,力求通过辨析史料建立事实;后者意图将已有事实“整合为一个连贯的历史叙事”。<sup>⑤</sup> 第二,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也基于组织事实的主观否定了史著再现的准确,只是切入点不是无形的史学家心理(需求或信念),而是可见的史著文本(历史叙事)。怀特在(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启发下指出,史著可分为编年、故事、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含五个层面。其中,编年是按发生顺序排布事件,故事是将编年排布为具有开头、中间、结尾的连贯过程,情节化是将故事改造为特定类型如喜剧或悲剧,形式论证是依据规律连结故事中的事件,意识形态蕴含是对当前社会体制的认识,它决定“历史演进和历史知识的形式”。<sup>⑥</sup> 显然,上述五个层面涉及史学家如何组织事实,而怀特坚信,史学家个人的审美和道德倾向决定各个层面的组织模式选择。<sup>⑦</sup> 安克斯密特大致认可怀特的结论,但其论证框架是分析的语言哲学。他指出,由于史著的结构“是施加或强加于过去之上,而非客观存在于过去本身的特定结构的反映”,<sup>⑧</sup>史著对应的不是某段过去,而是史学家根据个人观点连结事实形成的主观构造。

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与贝克尔、比尔德在结论上的相似表明他们持有两段式再现主义史学观,双方在切入点上的差异凸显了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学术贡献:他们对史著的文本性分析不仅将文学理论和语言哲学添入史学理论家的武器库,也为史学家释读文献和史著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sup>⑨</sup> 不过,文本分析进路也有负面效果:模糊了历史文本(史著)与非历史文本(文学)的边界。因此,对

① Carl Hempel,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 in History”, pp. 47 – 48.

② William Dray, *Law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p. 81.

③ William Dray, *Philosophy of History*, Prentice-Hall, 1964, p. 5.

④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30.

⑤ Frank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pp. 12 – 13.

⑥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pp. 5 – 7, 10 – 11, 25.

⑦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pp. 434 – 435.

⑧ Frank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p. 81.

⑨ Peter Burke, “Metahistory: Before and After”, *Rethinking History*, Vol. 17, No. 4, 2013, pp. 437 – 447.

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常见批评,是从不同角度论证过去对组织事实进而对史著的特殊制约:曼德尔鲍姆重申事实间关系决定组织事实,麦卡拉(C. Behan McCullagh)指出组织事实必须契合过去实情,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强调作为过去遗存的一手史料掌控组织事实。<sup>①</sup>不过,这类批评不论从哪里切入,其矛头是指向组织事实的主观性,而非史学的再现性及确定事实与组织事实的区分。

前述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的三场论争,奠基于一种两段式的再现主义史学观:史学是史学家与过去的再现活动,可分为确定事实与组织事实两个部分,前者关涉能否再现过去,后者关涉再现是否准确。两段式再现主义史学观由此构成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根基,串联起各家论说。<sup>②</sup>这反过来也意味着,与之相对的非再现主义史学观构成了西方史学理论底层话语的变革。借用布莱恩·费伊(Brian Fay)2017年对库卡宁论说的评述,它揭示并否定了“过去75年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共有内核”即再现主义的“史学肖像”,进而将西方史学理论“重新定向至全新方向”。<sup>③</sup>

当然,话语上的变革不能否定现实中的连续。从学术史角度看,正是两段式再现主义的问题催生了非再现主义。如前所述,在两段式再现主义的语境中,史学是史学家与过去的再现活动,史学家的组织事实决定史著能否准确再现过去。在此前提下,20世纪的西方学者要么将组织事实原则锚定为过去一侧(因果关系、普遍规律、行事动机),进而主张史著应是过去的准确再现;要么将其锚定为史学家一侧(当下需求、历史信念、审美道德),进而提出史著只能是过去的不准确再现。从史学实践的角度看,这两种对立性认识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两种互斥的史著评判准则:如果史著应是准确再现,符合过去这一客观准则就是评判某一史著是否应被接受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史著只能是不准确再现,符合过去就失去了充分性,史学家个人或群体的主观倾向就可进入史著评判,成为滋生相对主义的温床。20世纪70年代后,组织事实原则的主观性在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影响下愈加凸显,多数学者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以符合过去评判史著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不愿因此接受史著评判的主观任意,走入危险的相对主义。如何兼顾史著的主观与史著评判的客观由此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这正是库卡宁和罗斯转向非再现主义的根本动机。

## 二、非再现主义史学理论及其史学观

作为一个史学理论术语,“非再现主义”最早出现在库卡宁于2013年发表的《史学中的再现主义与非再现主义》,该文也被纳入其2015年著作《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在2016年被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会评选为史学哲学最佳专著,库卡宁也在2017年从安克斯密特手中接替他创办的《历史哲学杂志》主编(到2022年卸任)。该杂志的首批编委之一正是非再现主义史学理论的另一代表学者罗斯。1988年后,罗斯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非再现主义特征的论说,

① Maurice Mandelbaum, “The Presuppositions of Meta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9, No. 4, 1980, p. 45; C. Behan McCullagh, “Review”,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3, No. 3, 1984, pp. 399 – 401; Arthu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Including ‘Postmodernism’) 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1, 1995, pp. 18 – 23.

② 两段式再现主义主导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不等于这一时期没有与之相左的史学观,较早的学者有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较近的有列昂·戈德斯坦(Leon Goldstein),但他们的论说并未主导西方学界议程。

③ Brian Fay, “From Narrativism to Pragmatism”,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sue 11, 2017, p. 13.

但他直到2018年才确认它们可被归入非再现主义,并在2020年将之系统化为著作。<sup>①</sup> 尽管库卡宁和罗斯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不同步,但他们力图解决对主观性质的史著开展客观评判的难题,在解题过程中摒弃了长期规定西方史学理论的两段式再现主义,转而主张史学是史学家之间的论辩活动,旨在证成断言而非再现过去。

库卡宁的思想脉络可从其著作标题中的“后叙事主义”管窥一二。这一术语意味着他接受了叙事主义的部分论点并拒绝了另一部分。具体来说,库卡宁接受了叙事主义对史著客观性的否认,但并不因此认为史著无法客观评判。由此,他将自己的任务锁定为“找到用以评定不同历史阐释的准则,接受没有一个阐释是绝对正确的,并坚定地认为这不意味着怎么都行”。<sup>②</sup> 库卡宁之所以会在解题过程中转向非再现主义,直接动机是安克斯密特在此任务上的失败尝试。如前文所述,安克斯密特在两段式再现主义的前提下肯定了史著的主观性,与此同时,他也不愿像怀特那样接受史著评判的主观。<sup>③</sup> 1983年后,安克斯密特多次尝试在再现主义的“史著一过去”框架内建立客观评判准则,但从早期的“望楼”(belvedere)隐喻到后期的“明灯”(lamp)隐喻,其思路都是将评判准则锚定至借助史著认识的过去,而非史著本身所记述的过去。<sup>④</sup> 在他看来,组织事实的主观虽会损毁史著的准确,但能让人注意到更大的过去片段。例如,通过联系马伦哥战役、三皇会战、博罗季诺战役、莱比锡战役、滑铁卢战役,读者能认识到拿破仑是一位“悲剧军神”,由此注意到契合该形象的其他事件。安克斯密特认为,这一“其他事件”——他称之为范围(scope)或样貌(aspect)——的多寡决定着史著的优劣,进而决定着我们应接受哪一本史著。然而,库卡宁注意到,安克斯密特的评判准则难以应用于史学实践。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读者可经由同一史著认识到不同形象、规模的过去。此时,人们没有某种方法能够将其中之一确定为该书对应的范围或样貌。<sup>⑤</sup>

库卡宁相信,安克斯密特的失败意味着再现主义难以形成对主观史著的客观评判准则。因此,他决定摒弃“前分析的再现主义直觉”,不将史著视作对过去的某种再现,而将其视作支持或反对关于过去的某一断言的论证(argument)、试图改变既有过去断言的言说行动(speech act)。<sup>⑥</sup> 他的这一主张主要源自当代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的推论主义。布兰顿认为,说出一个断言即做出一个承诺:该断言是可靠的。作为承诺者,断言者有责任为该断言辩护,给出支持理由,索取反对理由。这就意味着,说出一个断言,即加入了给出和索取理由的游戏;说某一断言为真,即认可断言者的游戏资格,并为该断言做出自己的承诺。<sup>⑦</sup> 布兰顿的上述论说在两个方面契合了库卡宁的诉求。其一,说出断言即向他人做出承诺意味着,语言的本质不是事物的描画或再现,而是主体之间的交流工具,其再现功能即便存在也需服务于交流。其二,围绕断言的交流即围绕理由的游

① Krzysztof Brzechczyn, ed., *Towards a Reviv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round Paul A. Roth's Vis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p. 116 – 129, 278 – 280.

② Jouni-Matti Kuukkanen, *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2.

③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81 – 285.

④ Frank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pp. 201 – 206; Frank Ankersmit, *Meaning, 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09 – 113.

⑤ Jouni-Matti Kuukkanen, *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pp. 61 – 62.

⑥ Jouni-Matti Kuukkanen, *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pp. 61, 66 – 67.

⑦ Jouni-Matti Kuukkanen, *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pp. 144 – 146. 罗伯特·布兰顿:《阐明理由:推论主义导论》,陈亚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7—110页。

戏意味着,语言交流是受规则约束的理性活动,交流方式和内容的主观性不等于交流过程的无序性和交流效果评判的任意性。由此言之,将史著视作对过去断言的论证不仅是可取的,而且还能保证主观史著可以被客观评判。

据此,库卡宁提出,史学是史学家围绕过去断言的论辩活动,评判史著是否应被接受的依据不在于它是否符合过去,而在于它能否让他人接受它所论证的过去断言。用他的话来说,史著的评判准则不在于是否为真,而在于是否具有“认识论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认识论权威是可被赋予理论、信念、历史阐释等认知实体的东西……认识论权威因而从属于将某个实体视作在认识论上值得相信且令人信服的核心理由。”<sup>①</sup>随后,库卡宁总结了史著是否具有认识论权威的评判准则,将其分为“认识论的”“修辞性的”“话语性的”三类,分别强调论题的启发性和论据的支撑性、论证方法的说服力、论述的学术史背景,由此证明了史著可被客观评判。

罗斯与库卡宁的理论构建具有相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力图解析“作为可被理性评判的论证的历史解释”,<sup>②</sup>也都在解题过程中摒弃了再现主义,将史学视作论辩活动。不过,罗斯转向非再现主义的直接动机是再现主义的内在问题。如前文所述,再现主义的第一命题是史学家可以确定事实,并再现过去事件。在罗斯看来,这一命题预设了过去事件是等待被再现的给定客体,而他相信,过去事件实属史学家主观构建。若此论成立,再现主义自然就是应被摒弃的错误观念。为了论证过去事件的构建性,罗斯综合了三位学者,即丹托、戈德斯坦和科学哲学家伊安·哈金(Ian Hacking)的论说。<sup>③</sup>

罗斯重点分析了丹托的叙事句理论。丹托认为,叙事句是普遍存在于史著的一种特殊句子,它“同时指涉时间上分离的两个事件,但只描述(只关于)它所指涉的较早事件”。<sup>④</sup>一个例子是“圣路易于1214年诞生”。这句话描述了法王路易九世的诞生,但涉及不同时间的两件事:路易诞生与路易封圣。叙事句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属性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圣路易于1214年诞生”这句话若在1297年路易封圣前说出,就等于“路易于1214年诞生且将会封圣”,是对未来的预言,可真可假;该句若在1297年以后说出,就属于对事实的描述,真值固定。叙事句的属性变化带来一个问题。由于句子属性取决于描述对象,属性变化意味着对象变化。“圣路易于1214年诞生”在1297年由预言变为描述,意味着它描述的1214年路易诞生事件会在1297年改变,这与常识相左。丹托的解释是,变化的不是事件自身,而是它与其他事件的关系。<sup>⑤</sup>路易诞生不是在1297年变为圣路易诞生,而是在当年与路易封圣发生联系。由于“A与B的关系”属于A的性质,关系的增加等于性质的增加,进而等于A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既有事件不断与新生事件发生联系,由此不断变化。推言之,过去事件会随史学家所处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空史学家探究的过去事件并不相同。

丹托对叙事句的分析表明,过去事件会在史学家经历中重塑。不过,“重塑事件”的前提是“知

① Jouni-Matti Kuukkanen, *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pp. 137 - 138.

② Paul Roth,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Chiel van den Akker,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Theory*, pp. 156 - 158.

③ Paul Roth, *The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5 - 64.

④ Arthur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43.

⑤ Arthur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pp. 154 - 155.

晓待重塑事件”，而丹托没有论及后者。对此，罗斯引入了戈德斯坦的论点。戈德斯坦在其《历史认识》中指出，认识过去不同于认识现在：现在事件可通过感知器官或仪器实验被直接或间接观察，过去事件不可观察，史学家只能通过“历史研究中的构建”知晓过去。<sup>①</sup> 这就是说，史学家只能基于学术训练、特定理论，将某些东西推定为指向某段过去的证据，并在证据基础上运用特定方法，以逻辑推导的形式构建过去事件。<sup>②</sup> 例如，瓦拉不是通过回到过去亲眼见证，断言君士坦丁赠礼是伪造，而是在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关联、比较相关文献与其他时期文献，运用语文学的方法，推导出这一断言。“赠礼为假”不是基于经验性观察的客体性描述，而是基于推定性证据的推导性假说。

丹托和戈德斯坦的论说表明，过去事件是史学家基于个人经历和证据推导的构建。哈金指出了影响事件构建的深层要素：分类法（classification）。哈金认为，类别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社会构建，会因时因地变化，如性别类型在西方由两个被构建为多个。<sup>③</sup> 而且，分类法的变化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言说，进而改变所谈论的事件。举例而言，父母对子女的言语批评与棍棒殴打在旧时都属于教育；随着观念变化，今人会将其区分为教育与暴力。因此，对父母的言语批评与棍棒殴打，前人会将其描述为一件事，即家庭教育，今人会将其描述为两件事，即家庭教育与家庭暴力。分类法决定了我们会将哪些东西识别为一个事件；分类法一旦变化，我们的“事件清单”就会随之改变。这就意味着，事件不是天然存在于世界的最小元素，有着清晰的边界或形态，“事件只存在于描述”。<sup>④</sup>

三位学者的论说支撑了罗斯的“过去事件构建论”：过去事件不是边界清晰、独立自足、固定不变的给定客体，而是史学家基于分类方法、证据推导、个人经历的主观构建。在此基础上，罗斯进一步指出，“记述发展过程中事件顺序”的叙事性史著是对过去事件的构建和解释、对认知断言的证成（justification）。<sup>⑤</sup> 罗斯认为，过去事件构建论意味着所谓的“事件原因”并不是外在于事件的实存客体，而是构建性事件的内部构成要素亦即“开头”，事件的“顺序描述与对（其）因果联系的辩护没有功能性差异”。<sup>⑥</sup> 事件由开头到结尾的叙述次序既说明了事件如何及因何如此发展，亦体现着史学家如此构建事件的理由，决定其构建是否正当。因此，史著是对史论的证成而非对过去的再现。由此，罗斯与库卡宁会师于非再现主义史学观：史学是史学家之间的论辩活动。当然，两人并非没有分歧。指明史著是可被客观评判的断言论证后，罗斯并未像库卡宁那样进一步归纳具体的评判准则。他相信，现实中的史著评判并未统一采用一套准则，理论家无法确立普遍适用的准则。但是，在库卡宁看来，在普遍准则上保持沉默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会取消理论构建的意义。<sup>⑦</sup> “普遍准则是否可能”构成了两人的核心分歧。

当然，从整体上看，库卡宁和罗斯的共识大于分歧：他们承认史著的主观性，坚持史著评判的客

① Leon Goldstein, *Historical Knowing*,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pp. xviii - xxiii.

② Leon Goldstein, *Historical Knowing*, pp. 57 - 59, 128 - 129.

③ Paul Roth, *The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p. 39 - 40.

④ Paul Roth, *The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p. 41 - 46, 63 - 64, 28 - 31.

⑤ Paul Roth, *The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p. 7, 66 - 67.

⑥ Paul Roth, *The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p. 73 - 75.

⑦ Paul Roth, *The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 75; “Back to the Future: Postnarrativism Philosophy and Analyt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5, No. 2, 2016, pp. 279 - 281. Jouni-Matti Kuukkanen,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Normativity: The Case of Historiograph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49, Issue 5, 2019, pp. 1 - 33.

观性,通过摒弃再现主义、转向非再现主义,证明了主观性质的史著可被客观评判。从整个史学理论学科来看,他们的非再现主义史学观还有两个颇具价值的“副作用”。第一,非再现主义在摒弃再现主义的同时,也摒弃了确定事实与组织事实的区分,进而避开了这一区分造成的理论构建缺陷。如前文所示,在确定与组织的区分下,相关理论多会轻确定而重组织,由此造成理论内部的不融贯。这在怀特和安克斯密特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克里斯·洛伦兹(Chris Lorenz)和约翰·扎米托(John Zammito)基于后实证主义指出,事实确定同样具有主观性,但这并未取消其认知性,他们进而以此诘问怀特和安克斯密特:若否定该论断,就彻底否定了史著的再现性,进而否定了自己的前提;若肯定该论断,就难以说明为何组织事实的主观性取消了其认知性,进而否定了自己的结论。<sup>①</sup>除了理论内部的不融贯,确定与组织的区分也扩大了理论与实践的裂隙。很多史学家并不相信两者可在实践中区分清楚,他们更相信“可证实的事实与纯粹的阐释并非清晰分离的两个范畴,而是一个光谱或连续体。”<sup>②</sup>即便史学家同意两者可在理论中区分,他们首要关心的也多是事实确定问题,至少不只是组织事实。总之,确定与组织的区分容易使史学家相信,相关理论即便不是虚造,也是不完备乃至无用的。对比来看,非再现主义认为,确定与组织的区分并不存在,整个史学实践属于论辩活动,相关理论旨在揭示隐含在史学家论辩实践中的评判准则,并以逻辑方法(是否融贯合理)、比较方法(有何时空差异)、历史方法(如何确立演变)等加以检验。<sup>③</sup>基于非再现主义的史学理论具有相对更好的内部融贯性和外部应用性。

第二,非再现主义不仅是对西方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变革,也是建设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某种参照。这是因为再现主义史学观不仅存在于20世纪的西方,也存在于当代中国。卓立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在2019年分析其中的“史学家—过去”框架及其隐含的相对主义难题,进而提出应将“如何如实再现过去事实本身”问题转换为“如何获得确定的历史知识”问题。<sup>④</sup>只是他在后一问题上建议引入现象学,基于“超越经验个体的普遍主体和先验主体”建立确定的历史知识,而不是像库卡宁和罗斯一样关注主体间论辩。由此视之,非再现主义应是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不可忽视的某种外部参照。

### 三、非再现主义史学观的实践困境

通过摒弃长期规定西方史学理论的两段式再现主义,非再现主义史学理论成功证明了主观史著可被客观评判。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新问题。在两段式再现主义的语境中,史学是史学家与过去的再现活动,这保证了史学可以提供关于过去的知识;但是,在非再现主义的语境中,史学是

① Chris Lorenz, “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 No. 3, 1998, pp. 309–329; John Zammito, “Post-positivism Realism: Regrounding Representation”, in Nancy Partner and Sarah Foot,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 SAGE, 2013, pp. 413–417.

② Saul Friedlander, 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2.

③ 约尼·马蒂·库卡宁:《重新定义批判的与保守的历史书写》,张作成译,《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Jouni-Matti Kuukkanen, “Moving Deeper into Rational Pragmatism: A Reply to My Reviewer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sue 11, 2017, pp. 117–118.

④ 卓立:《走出历史认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史学理论话语范式的局限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2期。

史学家之间的论辩活动,看上去既不关于过去也不带来知识。正因如此,尽管安克斯密特在其评述中多次赞扬库卡宁的论说,甚至在一些核心主张(如整体主义)上与之妥协调和,但最终还是拒绝了非再现主义。安克斯密特坚信,史学家的论辩若不能带来(更好的)历史再现,就不具备任何目的和意义。<sup>①</sup> 总之,非再现主义在倒掉“主观评判”的洗澡水的同时,似乎也把“历史知识”的婴孩一并倒掉了。

对于这一质疑,非再现主义者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回应。库卡宁在2021年的《作为正确断言的史学知识》中,系统讨论了非再现主义语境中的历史知识问题。他提出,史学可以提供知识,且史学提供的知识是“涉及过去行动和事件的、被认为值得相信的句子”,如“十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史学提供的过去断言之所以值得相信,是因为它得到了证据的支持。<sup>②</sup> 那么,史学家使用的证据是什么?库卡宁指出,这一证据不会是关于相关过去的感官经验——史学家无法回到过去直接观察十月革命的爆发,只能是“基于其他陈述和信念的推论”。<sup>③</sup> 在此基础上,他借用芬兰2018年非虚构文著最高奖《工厂里的反抗》,梳理了史学家用以支撑其过去断言的推论性证据,包括基于档案文献的推论、基于材料融贯性的推论、基于史学或道德共识的推论、基于史学家专业身份的推论(断言者是公认的专业史学家,其断言值得相信)。库卡宁认为,上述推论是否成立,取决于推论过程是否遵守史学家共同认可的规则。这意味着,“与其将史学知识视作陈述与其对象的对应,不如视其为被许可的语言行动”。<sup>④</sup> 在非再现主义的语境中,作为史学论辩要素的史著之所以能构成历史知识,一方面因其论题是对过去的断言(这保证了它是“关于过去的”);另一方面因其对论题的论证遵循了史学家共同认可的规则(这保证了它是“知识”)。

库卡宁在历史知识问题上的解题策略,是将历史知识的检验标准界定为遵循集体性规则,以此证明作为论辩活动的史学可以提供历史知识。这一思路不仅与罗斯的主张一致,<sup>⑤</sup> 而且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亦不乏盟友。21世纪后,西方学界表现出将历史知识的检验标准锚定为史学家集体层面的趋势。美国学者阿维泽尔·塔克尔(Aviezer Tucker)在2004年提出,“异质的、非强制的、大范围的共识是历史知识的指示器(indicator)”。<sup>⑥</sup> 荷兰学者赫曼·保罗(Herman Paul)在2011年提出,“任何关注史学家如何评判知识性断言的历史哲学……必须详述史学家在评判时使用的认识论美德”,如“思想开明、诚实、公正”。<sup>⑦</sup> 爱沙尼亚学者马瑞克·塔姆(Marek Tamm)在2014年的论文中也持类似观点:“史著中的真实性断言的基础不是它们与现实的直接关联,而是作为探究方法、认知价值和认

① Frank Ankersmit, “A Dialogue with Jouni-Matti Kuukkanen”,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sue 11, 2017, pp. 53, 57.

② Jouni-Matti Kuukkanen, “Historiographical Knowledge as Claiming Correctly”, in Jouni-Matti Kuukkanen, ed., *Philosophy of History: Twenty-First-Century Perspectives*, Bloomsbury Academic, 2021, pp. 45–47.

③ Jouni-Matti Kuukkanen, “Historiographical Knowledge as Claiming Correctly”, pp. 47–49.

④ Jouni-Matti Kuukkanen, “Historiographical Knowledge as Claiming Correctly”, p. 64. 乔尼-马蒂·库卡宁:《何以走入歧途:史学、规范性与大屠杀之争》,冉博文译,董立河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⑤ Krzysztof Brzechczyn, ed., *Towards a Reviv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round Paul A. Roth's Vis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p. 121–123, 279.

⑥ 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0.

⑦ Herman Paul, “Performing History: How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s Shaped by Epistemic Virtue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1, 2011, pp. 17, 9.

识论美德的学科共识。”<sup>①</sup>

非再现主义者与上述学者之所以将历史知识的检验标准锚定为史学家集体层面,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其理论构建的现实基础是史学家实际在做什么,而非自认为在做什么。<sup>②</sup>从第三人称的外部视角观察史学实践,人们只能看到史学家接受专业训练、整理批判史料、提炼运用概念、提出解答问题、书写发表文著、与人交流争论等活动中的某一环节或共性。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家在理论构建上的这一共性,很大程度上源自盛行于当代西方哲学的自然主义认识论(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sup>③</sup>笛卡尔开启“认识论转向”后,非经验或前经验的理性、想象、逻辑就被普遍视作认知的基础,以此确立认知评判的诸种规范如“真”。作为其挑战者,自然主义认识论相信,“关于信念获取的描述性问题是关于信念获取的规范性问题的重要基础”,<sup>④</sup>对现实中实际发生的认知活动的经验性描述可以提供认知规范。这一信念的关键推动者是美国哲学家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他在1969年的《自然化的认识论》中提出,认识论应以“自然现象即物理性的人类主体”为重心,关注人类主体如何由“被给予的、特定的、受实验控制的(感官)输入”产出“对三维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sup>⑤</sup>奎因的主张虽然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和改造,但其内核——以经验性的认知活动研究并解答认知问题——却在相关讨论中得到传播和接受。21世纪后,自然主义已成为当代分析哲学的“意识形态”。<sup>⑥</sup>

从理论构建的角度看,非再现主义者对历史知识问题的回应正当且有效:将历史知识的检验标准界定为遵循集体性规则,既契合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哲学的新近论说,贴合外部视角下的史学实践即史学家的实际工作,也能证明非再现主义并不否定史学可以提供历史知识。然而,从理论应用的角度看,非再现主义者的回应并不同等有效。这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知识检验标准的界定背离了第一人称的内部视角下的史学实践,即史学家对自身工作的自我认知,反而会导致非再现主义更难被史学家接受。对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历史知识的检验标准只能是“真”,即相对准确地记述过去、某种意义上符合过去。<sup>⑦</sup>因此,史学家们大概率会认为,将历史知识的检验标准界定为遵循集体性规则,非但没有挽救非再现主义对历史知识的消解,而且凸显了它对历史真实性的否定。

对于这一质疑,非再现主义者同样试图在理论构建层面进行有效回应。在为《劳特里奇史学理论指南》撰写词条“真”时,库卡宁梳理并拒绝了传统的真理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肯定了较新的实用主义紧缩论(deflationary theory):“在句中使用‘真’(仅)意味着做出某种行动,如声明或背

① Marek Tamm, “Truth, Objectivity and Evidence in History Writing”,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sue 8, 2014, p. 265. 马瑞克·塔姆:《历史书写中的真理、客观性和证据》,顾晓伟译,《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② 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p. 4.

③ Jouni-Matti Kuukkanen,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Normativity: The Case of Historiography”, p. 5.

④ Hilary Kornblith, ed., *Naturalizing Epistemology*, The MIT Press, 1994, p. 3.

⑤ W. V. O. Quine, “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in Hilary Kornblith, ed., *Naturalizing Epistemology*, p. 25.

⑥ Jaegwon Kim, “The American Origins of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Vol. 28, Issue Supplement, 2003, p. 83.

⑦ Mark Donnelly and Claire Norton, *Doing History*, Routledge, 2011, pp. 53–54. 赵轶峰:《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书”。<sup>①</sup> 库卡宁提出,史学中的“真”可被理解为对过去断言的认可,并且这一认可应是合乎史学论辩规则的推论。<sup>②</sup> 由此,与历史知识问题的情况一样,通过将“真”界定为契合史学家实际工作的“遵循规则的认可”,库卡宁试图证明非再现主义并未取消“真”。

然而,库卡宁对历史真实性问题的论述同样存在背离史学家自我认知的情况,这一背离甚至更为严重。由于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普遍将求真视作史学根本,将“符合”视作“真”之内核,放弃真理符合论、采用实用主义紧缩论不仅更难被史学家接受,甚至还会动摇史学根基。其一,在史学门类日益增多的今天,真理符合论是史学各分支的共有基因,是不同史学部门进行学术对话的基础前提,贸然摒弃至少会在短时间内破坏史学的学科集体性。其二,真理符合论不仅是史学家共识,更是公众共识,而人们赋予史学的一切功用——身份认同、公民教育、辅助决策——的实际发挥,取决于史学家与公众享有同一真理论带来的公众对史学家成果的信心和主动接受。因此,摒弃真理符合论可能会导致史学家与公众的底层断裂,进而从根本上取消史学的社会合理性。这意味着,除非史学家和公众普遍放弃真理符合论,否则非再现主义对历史真实性问题及对历史知识问题的回应就仅具有理论构建层面的积极性,它在理论应用层面的实践困境就很难真正得到化解。

## 结 语

史学观是一切史学理论的基础,规定了史学理论的构建方向。总体来看,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的三场论争奠基于同一种史学观:史学是史学家与过去的再现活动,由确定事实与组织事实两部分构成。这种两段式再现主义史学观,将西方史学理论的构建方向规定为主观能动的史学家该如何组织客观真实的事实,由此产生了如何客观评判主观史著的相对主义难题。在解决这一难题的过程中,库卡宁和罗斯不约而同地摒弃了两段式再现主义,转向了非再现主义史学观,将史学视作史学家之间的论辩活动,将史学理论的构建方向确定为史学家如何证成断言,试图由此证明主观性质的史著可被客观评判。

不过,非再现主义在消解相对主义难题的同时,似乎也消解了史学的知识性和真实性。对此,非再现主义者虽然试图基于史学家的实际工作回应,但由于“史学家实际上在做什么”与“史学家自认为在做什么”当下尚不一致,非再现主义越贴近前者,反而越难被研究者接受,甚至会损害史学事业。因此,对非再现主义的史学理论仍需谨慎分析。

(作者苏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邮编:475001)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崔 瑾)

<sup>①</sup> Jouni-Matti Kuukkanen, “Truth”, in Chiel van den Akker,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Theory*, p. 317.

<sup>②</sup> Jouni-Matti Kuukkanen, “Truth”, pp. 326 – 328.

# SUMMARY OF ARTICLES

## **Theoretical Thinking is the Sou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 Zhang Yanguo**

The study of history is not only a cultural activity of humanity and a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cultural practice for the whole world and all mankind. By essence,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s a theoretical discipline, which always requires theoretical thinking. Theoretical thinking is the sou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nly with theoretical thinking can we bestow the wings of wisdom onto historical research, allowing the latter to more fully embody its social function and exert its cultural influence. Theoretical thinking is a unique form and method of thinking developed by human beings at a certain stage in history. It is a significant support for humans to promot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e the achievements of civilization. It i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Marxism to observe humanity, to study history, and to illuminate the future. Theoretical thinking is not only the spiritual backbone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but also the driving force and vital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and innovative basis for the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Each era has its main theme and subject matter, and historians are required to pick up the historical pen, innovate historical knowledge, display their talents, accumulate national sentiments,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main body, and embody the penetrating power of thought in historical research. Only with strong theoretical thinking can historical researchers express a loud and clear voice of thoughts, exert strong theoretical insights, write a new chapte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promote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 **Marxism and the Study of Greco-Roman History in Japan // Dong Haitao, Xu Xiaoxu**

Marxism has had a lasting impact on studies of Greco-Roman history in Japan. In the 1920s, some progressive Japanese historians began to apply Marxism to the study of Greco-Roman history. After World War II, a trend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emerged in Japan. Japanese Scholars of Greco-Roman history, such as Hidemichi Ohta, Masaoki Doi, and Tōru Yuge, hav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theories on issues such as ancient class struggle, the nature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forms in ancient Western Europe. After the 1980s, traditional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tudies faced challenges, but Japanese scholars began to study specific issu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such, Marxism was transformed into a research method in the study of Greco-Roman history in Japan.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enduring influence of Marxism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in Japan reflects the progressive enthusiasm and open-mindedness of Japanese scholars. This developmen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significant guiding value of Marxism itself.

## **Non-Representationalist Theories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Reshaping of Contemporary Views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West // Su Meng**

Views of historiography are the foundation of all historiographical theories. Broadly speaking, Western theories of historiography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re based on the two-tiered representationalist view of historiography through which the discipline was deemed as a representational act between historians and the past. As such, historiography was split into two parts: establishing facts and

organizing facts. In the last decade, scholars such as Jouni-Matti Kuukkanen and Paul A. Roth have challenged this long-standing view of historiography that has dominated Western theories of history.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y argue that historiography should be seen as an argumentative act between historians and others, aiming at justifying claim(s) rather than representing the past. By grounding historiography with non-representationalist views, their theories of historiography not only re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objectively judge the subjective nature of historical writings, but also fit neatly with historians' actual practice. However, non-representationalism fails to conform to historians' self-perception of their work, which might result in historians' rejection, even potentially undermining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Thus, scholars should treat non-representationalism with careful analysis.

**The Narrative of “Civilization” in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 Ma Kefeng and Wang Zico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Western-originated “civilization” narrative and the “evolution” thought had a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History textbooks use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ere also profoundly transformed by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s a historiographic genre. The narrative of “civilization” promoted both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justified the colonial aggression of the imperialist powers. These contradictions were also reflected in history textbooks. On the one hand, these textbooks were infiltrated by concepts such as “hierarchy of civilizations” and “struggle for survival”, which implicitly endorsed Western colonial expansion and imperialism. On the other hand, driven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pursuit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civilizational self-awareness, these textbooks not only limited the scope of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but also emphasized the continuity of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vision for a world with “multiple civilization”.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a civilization narrativ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gan to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history textbooks in China.

**“A Reversal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n Yin and Zhou Dynasties”: Fu Sinian’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Dynasty // Liu Chunqiang**

Fu Sinian was regarded as the “standard-bearer and helmsman” of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School. He was not only the decision-maker of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the Yin Ruins in Anyang in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ut also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hang dynasty. Fu Sinian explored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dynasty with a scientific spirit, whose research approach transitioned from literary history to historiography and the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is process, the study of the Shang dynasty developed as the focus of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rming a distinctive academic style. Fu Sinian's study of the Shang dynasty reflects his cultural concerns, turning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issues into practice.

**Shared Root but Divided Paths: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Hu Yuzhe**

The kinship betwee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has been deeply imprinted on the two discipline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in early years had always centered on political research, and historians collaborated with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study historical politics. However, as both disciplines became more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ized,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radually separated. The resumption of their cooper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in both disciplines after World War II. In the 1970s and 1980s, with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in history and the internal fragment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o trivial political segments and a move towards post-behaviorism. 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once again diverged. Despite all the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history has extensively borrowed concepts and methods from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science has also recognized the necessity of borrowing insights from history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This led to both disciplines' renewed attempts at collaboratio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Political science started to explore new fields such a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research on American